



挺身而出

积极为“江亚轮惨案”善后

抗战期间，龚延芳热衷于搞慈善救济事业。凡慈善、教育他无不热心奔走，捐募垫款，为造福家乡和旅沪宁波同乡，不遗余力。为此，他受到同乡们的普遍尊敬，成为旅沪宁波帮的领袖人物之一。

早在1921年，为了给旅沪同乡贫病无告者提供医疗服务，龚延芳就与当时上海商界名流、同乡朱葆三、方椒伯等人发起创办了四明医院并担任董事。

1933年，龚延芳参与建造宁波灵桥的筹资活动，其间他出资在家乡建延芳桥。同年5月，为改变家乡交通落后面貌，龚延芳联合张继光等15人集资70万元，创办宁穿（宁波至穿山）汽车股份公司，修建宁横公路，大大改善了宁波东部的交通条件。此后，龚延芳又相继在宁波投资宁波太丰面粉厂、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等，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另外，龚延芳担任旅沪宁波同乡会学董委员期间，配合会长虞洽卿，致力于兴办旅沪宁波子弟的教育事业。直至抗战前夕，宁波同乡会已在沪开办小学10所，在校学生达3460名，成为宁波同乡会成就最显著的一项成果。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1948年12月3日，满载3000多名乘客的招商局“江亚轮”，从上海驶往宁波途中，在离吴淞口外30海里处洋面上突然发生爆炸，导致轮船沉没，罹难者约2100多人，造成了我国航运史上震惊中外的惨案。事发后，遇难者家属群情激昂，认为招商局抢救不力，推诿责任，草菅人命。当时，在沪主持宁波同乡会工作的龚延芳鉴于死难旅客多为宁波同乡，即以“宁波旅沪同乡会”名义，组织成立“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并担任主委。他不顾年事已高，奔走于各方之间。负责处理罹难者打捞、认领、安葬、赔偿等诸事项。

声名日隆

周恩来“颇予嘉勉”

1946年6月，国民党掀起全面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当时上海各界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国、共和美国特使马歇尔三方，呼吁和平。在推选工商界代表时，包达三、盛丕华认为龚延芳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致力于实业救国，又是无党派人士，与各方面都比较熟悉，社会声望很高。

6月23日，在上海10万余人游行欢送下，龚延芳与盛丕华、包达三、吴耀宗等11人组成的代表团，乘火车北上请愿。当晚，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包围殴打达5个小时，马叙伦等4名代表受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周恩来闻讯后即与董必武、邓颖超到医院慰问，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未受伤的代表临时公推龚延芳为负责人，访问各方面人士和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要求见蒋介石。6月28日，在各界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蒋介石终于露面，但他拒绝接见全体代表，只答应见龚延芳一人。

南京之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血的事实使龚延芳有了一次深刻的认知。1946年初秋，周恩来、邓颖超在上海时亲自走访龚延芳，与他促膝晤谈。龚延芳十分感动，陪同他们参观自己所办的福利事业，包括学校和医院。对于龚延芳热心于公益、为和平奔走的种种努力，周恩来“颇予嘉勉”。这件事，龚延芳在晚年一再提起，可见对他的影响之大。

1949年9月，龚延芳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后，他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内河航运局局长等职。同时，他经常深入上海航运企业调查研究，运用自己从事航运业的丰富经验，为建国初期上海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春，大病初愈的龚延芳坚持远赴浙东沿海视察渔民，6月初再赴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由于连日劳累，引起消化道出血，8月8日，龚延芳经华东医院抢救，医治无效，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宁波帮人士就这样走完了他人生旅途的第75个春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工商界的著名宁波帮人士中，有不少在经济管理和社会公益等多方面都颇有建树的社会活动家，其中有一位，被形容为“经营范围之广，福国泽民之大，环顾国内，殆难数觐，虞洽卿之后，一人而已。”

他就是龚延芳。开国大典那天，他曾作为上海工商业的代表之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这一历史性事件。

记者 林昊

出身贫寒

运输业是他事业的起点

1883年5月22日，龚延芳出生在镇海枫林石门前黄村（今属宁波北仑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龚德祚，早年在家务农，仅靠祖传的三亩薄田维持生计，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龚延芳是家中长子，他还有两个妹妹。为了维持日趋窘迫的生活，父亲背井离乡，到上海一家柴炭店当出店（送货杂务工）。

在龚延芳12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忙料理农活。1897年，年仅14岁的龚延芳告别了家人，跟随表兄到了山东青岛，在宁波老乡开设的“新顺记”南货行当了一名学徒。尽管他读书不多，但手脚勤快，业余时间还自学英文和商业知识，越发讨店主喜欢，一满师即留下来做了店员。但龚延芳渴望去更多的地方长见识，学手艺，于是在1902年，经朋友介绍，龚延芳去了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大上海，进入德商亨宝轮船公司，成了一名职员。

这份工作对在外闯荡多年的龚延芳来说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由于他精明干练，处事得体，加之在对外往来中恪守信用，深得亨宝公司客户——直隶井陘矿务局负责人的赏识。以此为契机，1907年，龚延芳受聘担任该局及北票煤矿驻沪经理。只读过几年私塾的龚延芳对知识一直很渴望，为了在上海站稳脚跟，每个月，他都从不多的薪水里挤出一部分去补习文化课，十分勤奋。1910年，他又辞去该职，进入当时上海最大的运输企业——中华捷运公司当职员。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龚延芳升任为公司总稽核。

跨界发展

主持浙兴银行地产部

1920年，龚延芳经中华捷运公司董事会推派，赴欧洲各国考察运输事业发展情况。欧洲之行，大大开阔了龚延芳的视野，欧洲各国发达的交通运输业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担任中华捷运公司总经理之后，龚延芳充分利用中华捷运公司这一经营舞台和上海的独特优势，大胆改革，借鉴欧洲各国发展交通的经验。1925年，鉴于当时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受损现象相当严重，为减少托运客户的损失，龚延芳在上海独资开设信平保险公司，承接托运客户的担保业务，然后再向美商美亚保险公司转保。把保险与运输业务结合起来，这一经营方式很受客户的欢迎，有关业务得到了迅速发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上海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龚延芳应邀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兼任地产部经理。这个地产部其实是该行新开设的业务部门，实行经理独立经营制，自负盈亏。龚延芳到任后，见机进行了大宗房地产开发。当时，他发现上海静安寺、西摩路（今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一带，发展前景甚好，便大胆买进大批空置土地，建设沿街商业用房、民用住房和与之配套的菜场等设施，推向市场后广受欢迎，新开发的房屋销售一空。

可惜好景不长，“一·二八”事变后，上

龚延芳

一位德业双馨的
爱国实业家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中华毛纺厂股份有限公司股款收据，肆仟股实收股款国币肆万元。龚延芳时任该公司筹备主任。



1946年6月，部分和平入京请愿代表合影。左起：龚延芳、胡子婴、盛丕华、张嗣伯、阎宝航、雷洁琼、包达三和马叙伦。

海房地产业一蹶不振，市场一片萧条。龚延芳不甘心无所作为，在困境中又发现了商机，他在虹口斯高塔路（今山阴路）、狄斯威路（今深阳路）一带闲置土地上，建造了大片三层楼四层楼住宅，以低廉租金开展租赁业务，部分住宅供浙江兴业银行职员居住，再一次取得成功。在市场萧条的形势下，“浙兴”房地产业一枝独秀，仍然保持了稳步发展。